## 对丘脑底核的刺激逆转中额叶对决策阈值的影响

# Subthalamic nucleus stimulation reverses mediofrontal influence over decision threshold

James F Cavanagh<sup>1</sup>, Thomas V Wiecki<sup>1</sup>, Michael X Cohen<sup>2,3</sup>, Christina M Figueroa1, Johan Samanta<sup>4,5</sup>, Scott J Sherman<sup>4</sup> & Michael J Frank<sup>1,6,7</sup>

<sup>1</sup>Department of Cognitive, Linguistic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, Brown University, Providence, Rhode Island, USA.

<sup>2</sup>Department of Psychology, University of Amsterdam, Amsterdam, The Netherlands.

<sup>3</sup>Department of Physiology, University of Arizona, Tucson, Arizona, USA.

<sup>4</sup>Department of Neurology, University of Arizona, Tucson, Arizona, USA.

<sup>5</sup>Banner Good Samaritan Medical Center, Phoenix, Arizona, USA.

<sup>6</sup>Department of Psychiatry, Brown University, Providence, Rhode Island, USA.

<sup>7</sup>Brow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, Providence, Rhode Island, USA.

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J.F.C. (jim.f.cav@gmail.com) or M.J.F. (michael\_frank@brown.edu).

Accepted: 15 June 2020 by Neuroscience

#### (translated by zang jie)

**摘要:** 驯服自己的冲动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。尽管内侧前额叶皮层 (mPFC) 广泛地牵涉到对行为的努力控制中,但据认为丘脑下核 (STN) 可以通过在决策 冲突期间阻止皮质-纹状体功能发挥作用,从而为正确的决策做出准备。使用决 策的漂移扩散模型,我们发现 mPFC 活性的试验间增加(EEG theta 功率,4 - 8Hz) 与证据积累的阈值(决策阈值) 随冲突的增加而相关。帕金森氏病患者对 STN 的深层大脑刺激逆转了这种关系,从而导致了冲动的选择。此外,在这些相同的 高冲突决策中,STN 区域的颅内记录显示活动增加 (2.5-5Hz)。在这些慢频带 中的活动可能反映了皮质-基底神经节沟通调节决策过程的神经基础。

## 1、引言

人们普遍认为前额叶皮层 (PFC) 有助于对行为进行有意的控制<sup>1,2</sup>,但是这种影响的许多机制细节尚待确定。在这里,我们描述了在困难的选择过程中,PFC 基础神经节系统如何执行更慢,更受控制的决策。已经提出了 mPFC 可以基于对内源性或外源性冲突的评估来实例化对行为的控制<sup>3,4</sup>。当需要控制时,mPFC 与基底神经节的 STN 通信,后者充当皮质-纹状体系统的制动器,以促进更深思熟虑的反应过程<sup>5,6</sup>。STN 从 mPFC 接收直接投影,形成一个"超直接"途径,可以快速调节皮质-纹状体的加工过程<sup>69</sup>。这种架构使 STN 非常适合从 mPFC 中接收动作选择的处理,并最终对其产生影响。

皮质基底神经节功能理论预测行为在线调节中 mPFC 和 STN 之间的相互作用,特别是当习惯性反应被忽视以做出计划性和受控性反应时。尽管 mPFC 参与了候选运动动作的促进和抑制,但 STN 被认为主要抑制了特效动作[10,11]。根据此框架,mPFC-STN 通信可在皮质-纹状体信号传导会诱发冲动反应的条件下发挥控制作用。尽管有证据支持超直接途径的想法,但其中大部分仍是相关的(功能磁共振成像,白质束层成像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电生理学)<sup>7,10-13</sup>。

通过高频深部脑刺激(DBS)破坏 STN 功能是帕金森氏病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疗方法,它提供了在监控决策和行动控制的同时操纵 STN 区域的机会。可以预料,DBS 可以在受影响的人的日常生活中诱发冲动<sup>14</sup>,这种效应可以在实验室中捕获。

先前的一项研究报告说,当面临困难的决策时,STN-DBS 破坏了自适应减 慢的趋势<sup>15</sup>。基于决策中基底神经节功能的计算模型,提出了 mPFC 在响应冲突 中影响 STN 中的处理以调节决策阈值<sup>5</sup>,而 DBS 会干扰该功能,从而导致冲动。 至关重要的是,可以从响应时间分布的计算模型中推断出决策阈值的这种抽象度 量。这种基于模型的方法有助于解析多个潜在过程之间的差异,这些潜在过程已 建议在准确性和响应时间中得到反映。但是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经验数据可以 证明冲突期间此类 mPFC-STN 相互作用。

脑电疗法(EEG)通常用于评估冲突和控制期间的 mPFC 活动 <sup>3,4</sup>。具体来说, 在惩罚,错误或冲突之后, mPFC 上的 θ 带功率会增加, θ 功率的增加程度预示 着随后的响应时间会变慢,这暗示了自适应控制的直接作用 <sup>17-19</sup>。因此,此 EEG 功能是用于测量 mPFC 对冲突相关阈值调整的影响的有前途的候选者,同时可通 过 DBS 操纵 STN 区域的有效功能(见图 1a)。



图 1 理论模型,任务和性能。(a)决策阈值的 mPFC-STN 选通模型。行动计划是在皮质-纹 状体环路(虚线)中确定的。在检测到 mPFC 冲突的情况下,STN 通过提高纹状体门控行动 计划所需的阈值来抑制行为输出。这会导致冲突时间有所变化(实线)。DBS 到 STN 会中断 此过程,从而导致 mPFC 调节控制的能力受到破坏。RT,响应时间。(b)任务动态。在培训 期间,参与者学会了在每对中选择一个项目(称为 A/B 和 C/D),这些项目得到了更频繁的 强化(A/B,100%/0%; C/D,75%/25%)。在此示例中,蝴蝶可能是 A,而钢琴可能是 B。 在测试过程中,参与者必须选择更好的刺激,从而导致双赢(A/C)和输赢(B/D)的高冲突 选择。)以及低冲突的选择(A/D,C/B)。例如,如果蛋糕在训练中为 C,这将反映出高冲 突的双赢提示。(c)研究 I 表现数据(平均值±s.e.m.)。(d)研究 I 冲突适应以准确度 (均值±s.e.m.)划分。与正确(而不是不关闭)DBS 的试验(\*\*P<0.01)相比,次优试验 相对较快。

在这里,我们提供了来自两项单独研究的证据,其中我们操纵或直接测量了 STN 区域的活动。健康参与者和帕金森氏病患者在记录并发脑电图的同时,进 行了强化学习和选择冲突任务。对受影响的个体进行两次测试,在 DBS 开启或 关闭条件之间交替。在响应冲突期间,响应时间和模型估计的决策阈值随皮质 theta 的增加而增加,但是 mPFC θ 和决策阈值之间的这种联系被 STN-DBS 颠倒 了。术中 STN 区域的记录提供了在这些相同的高冲突情况下活动增强的直接证 据。我们得出结论,面对决策冲突,STN 对于促进适应性皮质-基底神经节反应 很重要。

### 2、结果

#### 2.1、关闭与开启 STN-DBS

我们的强化学习和选择冲突任务涉及训练的多个交错阶段,在其中学习了刺激强化的可能性,并进行了测试,在测试中,参与者被要求在涉及低(双输)或高(双赢)的新型刺激组合之间进行选择和失败)决策冲突(图 1b)。在学习 增强概率或在测试阶段(P值>0.40),中值响应时间(P值>0.17)或响应时



间变异性(t值<1)(图1c)。为了测试 ON 和 OFF DBS 差异对冲突相关适应性

图 2 DBS ON/OFF 研究:测试阶段的头皮 EEG (FCz 电极) 被高低冲突分开。(a) 在开和关条件下,与基线相比,刺激的表现和反应佣金具有明显的  $\beta$  功率抑制和 theta 功率增强的特点,在此将它们结合在一起。(b)提示锁定 theta 功率和响应时间(±0.1std  $\beta$ )的标准化回归( $\beta$ )权重中的高-低冲突差异的总图.FCz 位点显示在对照总图上。(c)线索锁定的 theta 功率和响应时间的标准化回归( $\beta$ )权重(平均值±s.e.m.),表明在高冲突试验中,DBS 逆转了  $\theta$  带功率的自然耦合,且响应时间变慢。

的特异性,我们将高冲突响应时间计算为低冲突产生的百分比变化,并将其作为 准确性的函数进行分析。 DBS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(ON,OFF)×价(双赢, 输-输)×准确性(次优,最佳)显示了价(F1,13=18.49,P<0.001)和准确性 (F1,13=5.43,P=0.036),价数与准确度相互作用(F1,13=4.56,P=0.05)。 在双赢审判,次优选择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方面,响应时间最快,这表明面对冲 突时的冲动性响应。

分别针对 ON 和 OFF 会话计算了随访计划的对比。我们在 ON DBS 会话中 发现了受影响个体的化合价 (F1,13 = 5.67, P = 0.033) 和准确性 (F1,13 = 14.07,

P=0.002)的主要影响;在输掉(P=0.009)和双赢(P=0.012)的情况下,做 出次优选择的反应要比做出最优选择的反应更快(图 1d)。在 DBS 会话关闭期 间,受影响的个体的化合价有一个主要影响(F1,13 = 17.89, P=0.001),但没 有准确性(F <1)。 OFF DBS 会话中受影响个体的准确度条件之间没有显着差 异(P 值>0.12)。因此,高冲突的次优选择似乎是由在 DBS 会话(而非 OFF) 中受影响的个体中的过早响应驱动的。

#### 2.2、脑电图和表现

提示和响应引起了 theta 能力的强劲增长和 β 能力的抑制(图 2a),如先前 在冲突处理和强化学习的研究中所见 17-20。筛选已从 EEG(在线方法)中删除 了 DBS 工件。值得注意的是,DBS 对 mPFC theta 功率没有条件性影响,这使我 们能够在没有 DBS 对 mPFC 本身影响的情况下测试试验到审判的大脑行为动力 学。因此,我们试图确定 mPFC theta 的试验间差异是否预示了与冲突相关的响 应时间调整,以及 STN-DBS 是否改变了这种关系。

先前的研究计算了与误差有关的脑电图 theta 功率与后续试验中的响应时间 之间的单一试验关系<sup>[17-19]</sup>。我们根据指示简单(低冲突)或困难(高冲突)决策 的线索,直接计算了响应的 theta-响应时间关系。条件内的估计值按标准化回归 权重(β)计算,正权重越大,θ功效和响应时间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强。请注意, 这些单独的回归权重分析与 DBS 对 EEG 记录的任何一般影响无关,在所有试验 中该影响都是恒定的。

提示相关的 mPFC theta 功率预测,在健康对照受试者和处于 OFF 状态但非 ON 状态的 DBS 会话的高冲突试验期间,较慢的响应时间(图 2b)。提示锁定 回归权重中存在显着的 DBS×冲突交互作用(F1,13 = 6.43, P = 0.025),而没 有主要影响(图 2c)。简单的对比显示,高冲突期间 DBS 条件之间存在差异(P = 0.006)。在高价效价条件(双赢与输输)之间或脑电图数据与响应时间锁定之 间没有区别(补充图 1 和 2)。为了确定在 OFF DBS 会话中看到的大脑行为模 式是否是人类认知体系的自然特征,而不是特定于帕金森氏病患者的特异性,我 们明确比较了 ON 和 OFF DBS 会话中健康参与者与受影响个体之间的 theta 响应 时间关系。(补充结果和补充图 3)。值得注意的是,对照组在 OFF DBS 会话 中与受影响的个体在 mPFC theta 和响应时间调整之间的关系没有差异(交互作 用,P=0.91;高冲突对比,P=0.52)。相反,在 ON DBS 会话中,这种关系与 控件之间存在显着差异(交互作用,F1,77 = 6.38, P=0.014),对于高冲突则具 有显着差异(P=0.013)。总之,提示锁定的高冲突 mPFC theta 功率预测响应时 间会增加; STN-DBS 取消了这种自适应减慢,并实际上揭示了 mPFC 与响应时间成反比的关系。可以使用动作选择的计算模型来说明这些模式。



图 3 DBS ON/OFF 研究:根据漂移扩散模型(纵坐标)估算的决策阈值的贝叶斯后验密度以 及它们如何随 mPFCtheta 的变化(abcissa)而变化。分布的峰值反映了该参数最可能的值。 通过至少 95%的分布在零的左侧或右侧来评估显着性。(a) theta 的简单影响。在 DBS 之 外,theta 的增加与高冲突试验的决策阈值增加相关,而与低冲突试验无关。在 DBS 上,高 冲突试验中 theta 的增加与决策阈值的降低相关,而低冲突试验中的阈值却与之相关。(b) Theta×冲突相互作用。由高>低冲突引起的 theta 的增加与阈值 OFF DBS 和健康对照的增加 有关。在 DBS 上看到了相反的模式。(c) 响应时间分布的变化反映了这些阈值效应。这些 图显示了 OFF DBS 会话中受影响个体的最佳和次佳选择的最佳拟合响应时间分布,其取决于 mPFC theta/阈值的高低。较高的 theta 功率与快速次优选择的密度降低和最佳响应时间分 布的更大分散性相关,这与增加阈值相吻合。

#### 2.3、漂移扩散建模

考虑到这些脑电图和冲突对响应时间的影响,我们试图确定行为结果的组合 模式是否可以由假设的 mPFC-STN 交互作用对决策阈值中与冲突相关的调整来 解释。为此,我们将参与者的选择与漂移扩散模型(DDM)<sup>16</sup>相结合,该模型 是两种替代性强制选择决策任务中使用最广泛的数学模型。DDM 可以同时考虑 正确和错误试验(此处为最佳试验和次优试验)的比例,以及每种任务条件下这 些试验的完整响应时间分布。在此框架中,行为响应时间分布被认为是根据决策 模型的潜在参数而产生的观察结果。核心参数包括证据积累率(漂移率),决策 阈值和非决策时间(捕获刺激编码和运动执行)。我们的神经模型表明,在刺激 呈现时,mPFC 首先根据给定刺激的执行概率来生成候选动作。当存在反应冲突 时(通过交替的皮层反应之间相似的激活水平反映),mPFC-STN 网络会提高决 策阈值,为皮层神经网络购买更多时间来评估和比较其奖励价值,从而导致速度 变慢,分散响应时间分布,以及至关重要的是,快速错误的比例相对较低。 为了检验此假设,我们采用了分层贝叶斯参数估计,该模型推导了扩散模型 参数的后验概率密度,同时为整个参与者组生成了观测数据,同时允许了个体差 异(请参见在线方法)。我们估计了回归系数,以确定在低冲突和高冲突试验中, mPFC theta 功率的试验间变化与决策阈值之间的关系,以及是否存在任何此类关 系与 DBS 状态相互作用。

对于在 OFFDBS 会话中受影响的个人,高冲突试验中的决策阈值与这些试验中 mPFC theta 的程度成正比(P=0.01;图 3a)。低冲突试验中没有这种作用(P=0.11)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打开 DBS(P=0.045)时,theta 对高冲突决策阈值的影响被逆转了(P=0.045),但对低冲突试验仍然没有影响(P=0.23)。高冲突(P=0.001)而不是低冲突(P=0.39)下的临界 DBS×theta 相互作用证实了DBS 状态对 mPFC θ 带功率与决策阈值之间的相关性的影响。即使控制了漂移速率对试验类型的影响,也发现了 theta 和 DBS 对决策阈值的这些影响。此外,无法通过假设额叶 θ 调节漂移速率来解释数据(这也会改变平均响应时间,但会对它们的分布和错误率产生不同的影响),证明了 mPFCtheta 和 STN-DBS 在改变潜伏性方面的特异性决策阈值参数(请参阅补充结果和补充表 1-3)。

mPFC theta 和阈值之间的关系优先应用于相对于低冲突决策的高冲突(theta ×冲突交互;图 3b)。积极的交互作用表明,相对于低冲突试验,高冲突 mPFC 对决策阈值的影响更大。在对照组(P=0.04)和 OFFDBS 会话中的受影响个体(P=0.02)中,这种积极的相互作用都是显着的。此外,尽管 OFFDBS 会话中的控制和受影响个体在 mPFC 的影响和决策阈值的调制方面没有差异(P=0.23),但 ONDBS 会话中的受影响个体表现出相反的关系,不同于两个控制个体(P=0.03)和关闭 DBS 会话(P=0.014)。

最后,我们研究了决策阈值的估计变化如何转化为响应时间分布(图 3c)。 较高的θ/阈值与更分散的响应时间分布和较低的快速次佳选择可能性相关。这 些贝叶斯 DDM 参数拟合通过使用 fast-dm 程序<sup>21</sup>的完整 DDM(非分层)分析得 到了证实(补充结果和补充图 4)。

#### 2.4、术中直接记录 STN

通过几乎相同的任务,我们在 DBS 植入期间测试了患有帕金森氏病的人。 受试者首先在手术前 3-5 小时执行任务,然后在手术期间记录 STN 区域活动再 次进行 DBS 植入。在外科手术前阶段,参与者在训练阶段的机率较高(t7=6.74, P=0.001,均值=准确度为 68%,标准误=8%),表明该任务在手术前已得到了 很好的学习。参与者在手术过程中的表现较差(M=58%, s.d.=21%; 配对样本的t检验无显着差异(P=0.12),这可能是由于手术环境的分散和压力所致。

颅内脑电图记录显示 STN 区域的低频功率增强和β功率抑制(图4)。高 冲突条件的特征是低频功率迅速减小,然后在背侧 STN 电极刺激后约 750ms 出



图 4 来自 STN 的颅内脑电图用于背,中和腹侧导联。在 STN 中同时观察到 β 抑制和 theta 增强。最右边的列显示通过排列测试揭示的条件范围的差异。高冲突试验的特点是导线之间 的低频功率减小,背导线中的提示后活动增加以及导线中的响应后活动增加。底行显示从 2.5-4.5Hz 过滤的颅内 EEG 数据。

现较大的提示锁定高增量功率(2.5 至 4Hz),-所有电极上的响应功率(3-5Hz)。 这些发现提供了证据证明,决策冲突反映在与 mPFC 中观察到的相同时期的本地 STN 区域活动中,尤其是与观察到的相似

在猴子单单元录音中<sup>11</sup>,在双赢和输负条件下(补充图 6),以及对表现最 佳的亚组进行事后分析(补充图 7),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效果。连同研究 I 的结 果,这些发现与以下观点相一致:mPFC 和 STN 在低频频段进行通信以表示决 策冲突,并且 STN-DBS 干扰了 STN 对决策冲突做出反应的正常能力(即,通过 调整决策阈值)。

## 3、讨论

对 STN 的直接操作和从中的记录产生了在冲突实例化控制期间 mPFC-STN 相互作用的电生理证据。众所周知,参与评估刺激和适应动作的认知系统可在皮质纹状体回路中实例化,包括 mPFC 和 STN<sup>5,7,10,11,15,17,18,22,23</sup>。有人提出了高频 STN-DBS 来损害该系统的动态功能和自我调节,从而导致冲动或计划不良的行为 <sup>5,15</sup>。我们的结果确定了低频段动态机制的潜在机械作用,用于在该网络中实 例化特定于冲突的通信。

特别是,我们发现 mPFC 活性预示着在高冲突试验期间决策阈值的增加,而 STN-DBS 扭转了这种关系:高 mPFC theta 与响应时间的加快和决策阈值的降低 有关。先前已经针对高冲突双赢试验描述了 STN-DBS 导致的冲突与响应时间之 间的这种逆向关系,在该试验中,多个高价值响应会导致冲动响应<sup>5</sup>。假设 mPFC 和 STN 相互作用以单向增加决策阈值 <sup>6-9</sup>,这一发现似乎令人惊讶。然而,我们 观察到的响应时间和准确性发现模式的先验计算解释 <sup>15</sup>表明,通过破坏 mPFC-STN 路线,DBS 可能揭示平行皮质-纹状体机制对促进高价值行动和减少 决策的影响阈值 <sup>23-25</sup>。

DDM 的仿真表明,在基于增援的决策过程中,阈值随基础神经节神经模型 和健康人类参与者的冲突而升高(R.Ratcliff 和 M.Frank,未发表的数据)。我们 发现,这种影响与 OFF DBS 会话中健康对照和受影响个体中 mPFC theta 的增加 有关,并且 DBS 干扰了这种关系。行为发现和跨研究重复的特异性<sup>15</sup>表明,在 ON DBS 会话中受影响个体的高冲突次优选择可能是由于过早的反应所致。我们 的结果扩展了这些发现,表明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决策阈值形式化的 mPFC-STN 相互作用介导的。尽管对 STN-DBS 可能会出现皮质的场扩散和反皮肤刺激,但 在 STN 区域反映了增强冲突的观察部分缓解了这一潜在的解释性问题。猴子电 生理记录数据也支持这种解释,因为 mPFC 和 STN 单位的活性与从 mPFC 到 STN10,11 的短等待时间的受控响应期间的行为抑制有关。

或者,可能通过对下额回(IFG)的 mPFC 效应间接介导 mPFC-STN 相互作用,然后通过 STN 抑制行为。确实,扩散张量成像研究表明 mPFC 和 IFG 都直接投射到 STN<sup>7</sup>。结合经颅磁刺激和功能连接性研究表明,尽管 mPFC 对于行为抑制是必需的,但其作用是通过先后投射到 IFG 和 STN<sup>13</sup>来介导的。其他神经影像学发现表明,决策阈值是由 mPFC 和纹状体之间的功能连接性调节的,而不是

由 STN<sup>23,24</sup> 调节的。但是,这些数据不是互斥的;尽管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,STN 会根据增强和决策冲突而动态地提高阈值,但其他研究集中在 mPFC-纹状体沟 通在降低超速精度折衷中降低决策阈值中的作用 <sup>23,24</sup>。实际上,这种类型的皮质 纹状体效应被认为会导致在 ONDBS 会话中在受影响的个体中观察到双赢的提 速,否则它会被完整的 STN 冲突处理 <sup>15</sup>抵消(另请参见补充讨论)。

提示 STN 和纹状体均发挥调节作用,反映在决策阈值的变化中,具有不同 的潜在机制 <sup>5,25</sup>。一些算法模型还假定,在 STN 中计算了响应冲突,在两个响应 的简单情况下,皮质基底神经节电路精确地执行了扩散决策过程 <sup>22</sup>。尽管与上述 神经模型和我们的数据大体上一致,但这种表述暗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由 STN 编码的冲突功能,与响应中证据的总和成比例。此功能意味着,在我们的低冲突 双赢情况下,STN 活动在双赢中最大,在输赢中最低,而在低冲突双赢情况下 则处于中间。相反,我们的术中记录数据表明,根据两个响应选项的相似性来处 理冲突(请参见补充图 6)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与 mPFC3 中冲突表示的有影响 力的理论相似,尤其是在 EEG 信号方面。

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,在低冲突和高冲突试验中均存在 mPFCtheta 功率(4-8Hz)增强,但只有在高冲突情况下才具有行为相关性<sup>[17-19]</sup>。在与冲突有关的行为调节过程中,这些低频频带的活动可能反映了皮质-基底神经节沟通的神经基础。值得注意的是,STN 区域反映的决策冲突与帕金森震颤的频率和 STN26,27 的相关振荡在约 2.5-5Hz 的相同范围内。模型在多巴胺耗尽的状态下还表现出缓慢的 STN 振荡活性<sup>[5,28]</sup>,并随着皮层冲突的增加而加剧<sup>[5]</sup>。尽管是推测性的,但是该模型预测,当受影响的个人面临决策冲突增加时,可以检测到更高幅度的震颤。

总之,我们发现 STN-DBS 动态改变了低频皮层信号与冲突相关行为适应之间的耦合。使用漂移扩散模型进行贝叶斯参数估计证实了这是 mPFC-STN 网络中断的结果,该网络在评估冲突后提高了决策阈值。该网络的改变促进了冲突引起的超速,这表明了 STN-DBS 诱导冲动的皮质-基底神经节相互作用机制。此外,术中记录表明,在学习到的高冲突情况下,STN 区域的特征是低频活动增强。我们得出结论,STN 对于为皮质-纹状体系统争取时间做出反应和应对冲突非常重要。因此,关于 DBS 协议的未来研究可能会受益于尝试保留 mPFC 和 STN 之间的这种低频通信,以减轻与 DBS<sup>14、15、29</sup> 相关的认知和冲动性副作用。

## 4、方法

方法和任何相关的参考资料可在该论文的在线版本中找到,网址为 http://www.nature.com/natureneuroscience/。注意:补充信息可在 NatureNeuroscience 网站上找到。

## 致谢

作者对 T.Norton 及其手术人员在术中记录会议期间的支持 L.Trujillo 对置换 方法的评论 E.J.Wagen makers 有关贝叶斯数据分析的咨询, J.J.B.Allen 和 E.F.Martino 提供了实验室资源,以促进一些数据的采集和分析,而 K.Carlisle 提 供了有关主题招募的帮助。该项目由 Michael J.Fox 基金会向 M.J.F.

## 作者贡献

M.J.F., J.F.C, M.XC.设计了实验。J.F.C., C.M.F., J.S 和 S.J.S.招募并参加 了参与者。J.F.C, M.XC 处理了 EEG 数据。T.V.W.和 M.J.F.设计了计算模型。J.F.C. 和 M.J.F.写手稿。

## 参考文献

[1] Miller, E.K.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cognitive control. Nat. Rev. Neurosci. 1, 59–65 (2000).

[2] Miller, E.K. & Cohen, J.D.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prefrontal cortex function. Annu. Rev. Neurosci. 24, 167–202 (2001).

[3] Botvinick, M.M., Braver, T.S., Barch, D.M., Carter, C.S. & Cohen, J.D. Conflict monitoring and cognitive control. Psychol. Rev. 108, 624–652 (2001).

[4] Yeung, N., Botvinick, M.M. & Cohen, J.D. The neural basis of error detection: conflict monitoring and the error-related negativity. Psychol. Rev. 111, 931–959 (2004).

[5] Frank, M.J. Hold your horses: a dynamic computational role for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in decision making. Neural Netw. 19, 1120–1136 (2006).

[6] Nambu, A., Tokuno, H. & Takada, M.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rtico-subthalamo-pallidal 'hyperdirect' pathway. Neurosci. Res. 43, 111–117 (2002).

[7] Aron, A.R., Behrens, T.E., Smith, S., Frank, M.J. & Poldrack, R.A. Triangulating a 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 using diffusion-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(MRI) and functional MRI. J. Neurosci. 27, 3743–3752 (2007).

[8] Inase, M., Tokuno, H., Nambu, A., Akazawa, T. & Takada, M. Corticostriatal and corticosubthalamic input zones from the pre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in the macaque monkey:

comparison with the input zones from the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. Brain Res. 833, 191–201 (1999).

[9] Takada, M. et al. Organization of inputs from cingulate motor areas to basal ganglia in macaque monkey. Eur. J. Neurosci. 14, 1633–1650 (2001).

[10] Isoda, M. & Hikosaka, O. Switching from automatic to controlled action by monkey medial frontal cortex. Nat. Neurosci. 10, 240–248 (2007).

[11] Isoda, M. & Hikosaka, O. Role for subthalamic nucleus neurons in switching from automatic to controlled eye movement. J. Neurosci. 28, 7209–7218 (2008).

[12] Fleming, S.M., Thomas, C.L. & Dolan, R.J. Overcoming status quo bias in the human brain. Proc. Natl. Acad. Sci. USA 107, 6005–6009 (2010).

[13] Neubert, F.X., Mars, R.B., Buch, E.R., Olivier, E. & Rushworth, M.F.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interactions during action reprogramming and their related white matter pathways. Proc. Natl. Acad. Sci. USA 107, 13240–13245 (2010).

[14] Hälbig, T.D. et al. Subthalamic deep brain stimulation and impulse control in Parkinson's disease. Eur. J. Neurol. 16, 493–497 (2009).

[15] Frank, M.J., Samanta, J., Moustafa, A.A. & Sherman, S.J. Hold your horses: impulsivity, deep brain stimulation, and medication in parkinsonism. Science 318, 1309–1312 (2007).

[16] Ratcliff, R. & McKoon, G. The diffusion decision model: theory and data for two-choice decision tasks. Neural Comput. 20, 873–922 (2008).

[17] Cavanagh, J.F., Cohen, M.X. & Allen, J.J. Prelude to and resolution of an error: EEG phase synchrony reveals cognitive control dynamics during action monitoring.J. Neurosci. 29, 98–105 (2009).

[18] Cavanagh, J.F., Frank, M.J., Klein, T.J. & Allen, J.J.B. Frontal theta links prediction errors to behavioral adaptation in reinforcement learning. Neuroimage 49, 3198–3209 (2010).

[19] Cohen, M.X. & Cavanagh, J.F. Single-trial regression elucidates the role of prefrontal theta oscillations in response conflict. Front. Psychol. 2, 1–12 (2011).

[20] Hanslmayr, S. et al.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dynamics of interference during the Stroop task. J. Cogn. Neurosci. 20, 215–225 (2008).

[21] Voss, A. & Voss, J. A fast numerical algorithm for the estimation of diffusion-model parameters. J. Math. Psychol. 52, 1–9 (2008).

[22] Bogacz, R. & Gurney, K. The basal ganglia and cortex implement optimal decision making between alternative actions. Neural Comput. 19, 442–477 (2007).

[23] Forstmann, B.U. et al. Striatum and pre-SMA facilitate decision-making under time pressure. Proc. Natl. Acad. Sci. USA 105, 17538–17542 (2008).

[24] Forstmann, B.U. et al. Cortico-striatal connections predict control over speed and accuracy in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. Proc. Natl. Acad. Sci. USA 107,15916–15920 (2010).

[25] Lo, C.C. & Wang, X.J. Cortico-basal ganglia circuit mechanism for a decision threshold in reaction time tasks. Nat. Neurosci. 9, 956–963 (2006).

[26] Hutchison, W.D. et al. Neurophysi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thalamic nucleus in surgery for Parkinson's disease. Ann. Neurol. 44, 622–628 (1998).

[27] Tass, P. et al.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cortical local field potential oscillations and Parkinsonian resting tremor. J. Neural Eng. 7, 16009 (2010).

[28] Humphries, M.D., Stewart, R.D. & Gurney, K.N. A physiologically plausible model of action selection and oscillatory activity in the basal ganglia. J. Neurosci. 26, 12921–12942 (2006).

[29] Thobois, S. et al. STN stimulation alters pallidal-frontal coupling during response selection under competition. J. Cereb. Blood Flow Metab. 27, 1173–1184 (2007).